

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三重新变化

提问：刘小昶 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群众诉求更加多样，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请问，如何理解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解读：孙林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教授

群众诉求更加多样

群众诉求是群众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从哪一种分类看，群众诉求都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呈现出追求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公平与效率交织的复合型特征，对群众工作的精准化、精细化、系统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生诉求提质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民生保障实现全覆盖，群众民生诉求不再局限于温饱、就业、住房等基础保障，而更聚焦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对更高质量的教育、更稳定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保、更优质的医疗、更宜居的环境、更完善的养老服务的期盼更为迫切。群众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点，已从兜底保障转向品质提升、从普惠覆盖转向精准适配、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个性化的需求持续增加，这就要求群众工作立足共同富裕目标，精准破解民生领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公平正义诉求愈发凸显。随着新时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群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显著增强。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异、公共资源分配、执法司法公正、劳资权益保障等成为群众诉求的高频焦点。同时，相较于物质利益，群众还越来越重视程序正义、机会平等、规则公正，对权力规范运行、公共资源公平分配、自身合法权益保障的敏感度大幅提升。

精神文化与治理参与诉求持续增长。新时代，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基础上，精神文化需求向着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优质文化供给、精神生活丰盈、个人发展空间成为重要诉求。同时，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深入推进，群众公共参与意识显著提升，尤其是青年群体、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公共事务协商、社会建设的意愿持续增强，民主表达、民意协商、建言献策的需求日益增长，群众工作亟须搭建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民主参与平台。

安全发展与长远诉求不断拓展。当前，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网络信息安全

全、财产权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基层风险防控、社会稳定治理等综合性、前瞻性诉求持续增多。同时，群众诉求呈现鲜明的动态化、网络化特征，线上平台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阵地，个体零散诉求极易通过网络聚合发酵，转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呈现出个体诉求与群体诉求交织、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交织、合理诉求与情绪表达的交织的叠加态势。利益协调、矛盾化解、民意引导的难度显著提升，这对群众工作的系统应对能力提出了考验。

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

群众工作作为一项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技术舆论、思想文化环境中开展，环境变化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新时代，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变革、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型、多元价值观念的激荡碰撞等，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群众工作的线下单一格局，形成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实体空间联动、传统治理风险与新型网络风险交织、内部治理压力与外部观念冲击叠加的复杂工作环境。

互联网、短视频、社交平台等重构了信息传播逻辑和民意表达路径，群众获取信息、表达诉求、交流观点、凝聚共识的阵地不断转移至线上。线上空间具有传播速度快、裂变效应强、跨越联动广、身份虚拟化的鲜明特征。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双向赋权”，也为群众工作赋能增效。这对党员干部的数字素养、网络理政能力、舆情处置水平提出了全新考验。

线下基层治理场域矛盾诱因多元交织。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基层矛盾呈现出存量未消、增量叠加、新旧交织的特点。征地拆迁、物业管理、邻里纠纷、劳资矛盾、产权争议等高频民生矛盾持续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与新型社会治理问题相互缠绕、相互关联，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碎片化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化解。在这种情势下，群众工作触点增多、风险点广、关联性增强，常态化矛盾排查、源头化解、多元协调的工作压力持续加大。

思想教育环境日趋复杂。在全球

化、信息化背景下，各类社会思潮通过网络渠道快速渗透传播，群众价值取向日益多元，思想认知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显著增强，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易受片面思潮、负面舆论影响，产生认知偏差、价值困惑，给主流思想引领、社会共识凝聚、党群同心带来挑战。

在把握变化中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

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准对象之变、回应诉求之变、适应环境之变，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

精准识别对象，推动群众工作从“粗放覆盖”向“分类施策”转变。针对群众工作对象多元化、碎片化、流动化的特点，建立常态化的群众结构分析研判机制，精准掌握不同群体的人数规模、分布特征、利益诉求和思想动态。着力补齐新社会阶层、流动人口、灵活就业人员等薄弱地带的工作空白，创新适应“社会人”状态的组织联结和联系服务方式，把传统群众工作的经验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结合起来，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精准对接诉求，推动群众工作从“被动回应”向“主动治理”转变。针对群众诉求多层次、复合性、动态化的特征，建立群众诉求收集、分类、办理、反馈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加强民意分析预判，做到未诉先办、源头治理。把解决民生痛点与回应公平关切统一起来，把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与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统筹起来，既要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事，又要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切实增强群众工作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精准适应环境，推动群众工作从“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针对网络空间成为群众工作新场域的趋势，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网络理政能力，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网络平台汇集民意、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同时，夯实线下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多元调解和协同治理机制，在线上线下联动中增强群众工作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还将始终伴随以少子化、老龄化为标志的人口变化趋势，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实施人口支持政策，同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目标和手段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民生挑战和生产率机遇，一方面要求显著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另一方面使之具有更强国家财力的支撑。

居民消费率提高要在更高供需平衡水平上达到。从供给侧来看，要善用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模型创造的各种手段，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把科技红利转化为庞大消费市场，创造更好的消费感受以扩大“消费者剩余”。从需求侧来看，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要逐渐把需求弹性小的普通品需求升级为更大需求弹性的优质品需求，开启巨大的需求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以“一老一小”为代表的新型基本需求仍会出现，创造出结构性超大规模市场的可能性。要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供需两侧的良好结合，要求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在贯彻实施“投资于人”上取得实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教育科技人才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阐明了三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揭示了新时代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成长依赖于教育体系，科技进步植根于人才支撑。一体推进，就是要打通三者之间的循环通道，使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支撑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产生的成果能够反哺教育升级，人才的创造性价值能够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充分实现。杨浦区是国家创新型城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区域内集聚了十余所知名高校和众多科研院所。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为根本遵循，通过强化党的领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主体合力、战略协同、要素贯通、机制耦合、效能倍增。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引领，健全一体化统筹协调、推进实施机制。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社会子系统，存在着地理空间、知识领域与组织机制的天然分隔。要解决“各自为战”、链条脱节问题，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各环节，通过加强政治引领和组织，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贯通、整体联动的推进体系，提升各项工作的一致性和匹配度，产生“1+1+1>3”的聚合效应。坚持将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置于区域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由区委统一领导编制相关规划、实施机构改革、制定专项政策，牵头组建区校企发展共同体，合力推进重大项目，集中配置数据金融等创新要素，培育开放应用场景，形成战略同向、推进同步、资源同调的全区“一盘棋”。

以一体化平台建设为牵引，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供需精准对接、资源高效整合。以重大使命驱动的创新平台是问题导向的教育改革实验场、需求引领的科技创新引擎、价值共创的人才发展高地，能够从前沿未知领域和产业共性需求中发现和转化鲜活的研究课题，汇聚各类创新主体进行系统性攻关，在有组织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交融传承，培养出具备跨学科视野、原始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本领的拔尖人才，对推动融合发展的作用最为直接。杨浦区坚持将高能级平台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枢纽与核心载体，与高校、科研院所、领军企业联手打造高能级平台矩阵，通过基础研发合作与前沿交叉创新平台汇聚全球智慧、深耕基础研究，“从0到1”催生颠覆性技术；依托高水平孵化器提供概念验证和创业服务，支持实现从技术到产品“从1到10”的关键跨越；深化大学科技园改革，强化生态枢纽功能，为师生打造创新创业的“首站”，较为有效地支撑了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协同进化，国家和市级重大科技成果产出量和落地率连年提升，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速汇聚。

以强化要素供给为支撑，营造一体发展的良好生态。在一个有机的创新系统中，各类要素的流动效率决定着系统的运行绩效。金融资本、数据资源和空间载体作为创新活动的基本投入要素，其配置方式直接影响着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的耦合质量。持续健全完善要素供给体系，推动资金、数据、场景等关键创新要素在教育、科技、人才体系间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才能构建起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引导金融资本精准赋能，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和人才发展全周期的金融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耐心资本，

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薛侃

投向早期硬科技和人才创业，加快形成“科技—金融—产业”的良性循环。充分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持续加大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改革创新能力，推动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协同，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突破传统资源要素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化空间载体支撑，结合推进实施高质量城市更新、盘活低效用地等工作，在更大尺度、更深层次上实现城区空间重构、功能布局优化和品质提升，升级释放出更多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新形态相适配的空间载体。

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交汇融合的现实场域，也是检验三者一体推进成效的最终标尺。产业连接着供给侧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与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和价值实现，是创新从理念到成果再到效益的完整闭环得以完成的决定性环节。产业创新的需求牵引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检验着人才培养的成效。坚持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具体需求为导向，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对接，才能将科创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的胜势。深化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关键是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教育体系，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模式、新路径。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既需要通过支持校企联合攻关、促进技术交易等方式加大高质量科技供给、引领产业创新，也需要引导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创新主体地位，以产业创新需求拉动科技创新突破。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综合运用以赛引才、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管理综合授权、集成式个性化服务等多种办法，提升产业所需人才引育用留的精准性、实效性、系统性。在实践中，坚持将打造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同部署、同推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质地与科技创新实力同步提升，主导产业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作者系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

(上接1版)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新动能的加速形成，也看到传统动能的加速消失。这种结构性调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然过程，终究要在产能的存量上表现出新与旧的消长，在产能的增量上表现出强与弱的分化。这就难免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深，在老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的同时，新挑战也表现出来。人工智能的颠覆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也必然带来更严峻的创造性破坏难题，亟待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促进就业创造和筑牢社会保障，确保劳动生产率红利得到均等分享。

从需求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加快“三驾马车”结构转变的紧迫性，也看到提高居民消费率是一项需要综合施策、久久为功的任务。无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消费率)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是一回事。常规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目的是在一种需求因素受到冲击时，采取适宜政策以调动其他需求因素，以确保经济增长不致因总需求不足而速度下滑。由于居民消费率受更长期因素影响，例如该指标与居民收入占比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均呈现显著正

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9和0.76，因此，该指标不会因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贡献率下降而自动提高，必须作为一种能力通过实质性的投入予以培养。

以“投资于人”破解供强需弱

破解供强需弱格局，既要依靠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超越短期和单一手段，充实并打通政策工具箱，把各种政策理念和实施手段融会贯通。提高居民消费率应从消费能力和意愿两方面，把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统一于共同目标下，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成功实践表明，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大幅度提高投资于人的力度，有望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例如，正是由于投资于人力度的增强，在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降低的同时，2010—2025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34.9%提高到40.0%，大约同期(2010—2024年)，中国GDP中用于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险福利和社会补助等支出的比例从52.6%显著提高到

61.2%。

扩就业、增收入和稳预期三位一体构成扩大居民消费的基础和长效机制。由于产业结构变革持续改变着就业形态、工作类型和技能需求，结构性就业矛盾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得到增强，因此积极就业政策也需要形成升级版，通过权益保障、技能提升和匹配水平改进，稳定就业数量和提高就业质量，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此外，增加收入与改善分配是相辅相成的要求，在通过人力资源市场增加劳动报酬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制度建设分享现代化成果和人工智能红利，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并借此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现代化共性和中国国情都表明，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实施再分配，通常采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方式进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数量增长、水平提高和范围扩大，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中国即将跨入以人均GDP表示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也只是一步之遥，生活品质的提高更需要由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中国